

四川大学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研究基地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

主办

现代中国 文化与文学

第6辑

XIANDAI ZHONGGUO
WENHUA YU WENXUE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四川大学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研究基地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 **主办**

现代中国 文化与文学

第6辑

XIANDAI ZHONG GUO
WENHUA YU WENXUE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 第6辑/毛迅,李怡主编. —成都:巴蜀书社,2009.5

ISBN 978-7-80752-340-6

I. 现… II. ①毛…②李…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②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2497 号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六) 毛迅 李怡 主编

责任编辑	李 蓓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028)84122206
照 排	成都完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9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230mm×170mm
印 张	19.75
字 数	480千
书 号	ISBN 978-7-80752-340-6
定 价	3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编委会名单

编委会主任

曹顺庆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编委

(以汉语拼音为序)

柏桦 蔡震 陈国恩 程光炜 陈方竞 丁帆
范智红 高远东 高旭东 郜元宝 何锡章 金龙云(韩)
孔范今 孔庆东 李今 李继凯 刘福春 刘勇
栾梅健 罗振亚 逢增玉 朴宰雨(韩) 谭桂林
王兆胜 王中忱 魏建 解志熙 岩佐昌暉(日)
袁国兴 杨剑龙 张中良 赵学勇 郑家建 朱栋霖
朱晓进 朱寿桐 邹红 张健 张福贵 周晓明

目 录

卷首语

重建诗歌精神的当下阐释	干天全	(1)
-------------------	-----	-------

郭沫若国际学术研讨会

郭沫若的万宝常研究之动机与意义	(日本) 藤田梨那	(7)
郭沫若与“千代松原”	(日本) 岸田宪也	(13)
《女神》中含有诗意的科学用语	(日本) 横打理奈	(23)
狂暴与柔情		
——博多湾赋予《女神》的两种性格	武继平	(26)

现代文化问题

“哈佛三杰”与新人文主义意念理性	朱寿桐	(32)
学科坚守与教学应变		
——现实压迫与现实诱惑中的现代文学教学思考	何希凡	(39)
囚笼与筌蹄		
——关于思、意、言的矛盾	李 蓓	(46)

文学史新论

“耻辱”的形象

——作为民族自我批评的鲁迅文学之二		
..... (日本) 九尾常喜著 秦弓译		(54)
鲁迅的死亡意识与现代性启蒙思想	刘义军 邬春立	(80)
启蒙者的爱与死：鲁迅小说《伤逝》再解读	汪树东	(87)
中国文学格局的现代转型		
——从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到“五四文学革命”	王桂妹	(95)
20 世纪 40 年代沈从文的存在体验		

——以《烛虚》为中心的考察	张 森	(104)
方言入诗的合法性辩难与认同焦虑	颜同林	(114)
知识之航与历史想象：重读吴兴华	张松建	(123)
“九叶诗派”质疑	邓招华	(144)
《朝霞》丛刊的文学生产、传播与效应	徐 江	(156)
论林莽《我流过这片土地》	(韩国) 白贞淑	(163)
《马桥词典》与昆德拉式的反讽精神	龚敏律	(181)
批评标准与《笨花》的考验	白 浩	(189)

中国文学档案

中国新诗档案：1955	刘福春	(198)
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及其他（一）	柏 桦	(222)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二）	陈思广	(278)

动 态

发现一个完整的陈敬容

——读《陈敬容诗文集》	令狐兆鹏	(304)
-------------------	------	-------

编年视角下的文学史重构

——评陈思广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	吴投文	(307)
---------------------------	-----	-------

稿约与稿例	本刊编辑部	(311)
-------------	-------	-------

Contents

Preface

The Current Interpretation of Reconstruction of the Spirit of Poetry ... Gan Tianquan (1)

International Sinology

- The Motivation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Guo Moruo's Study of Wan Baochang
..... (Japan) Tengtian Lina (7)
- Guo Moruo and "Matsubara Chiyoda" (Japan) Antian Xianye (13)
- The Science Language Containing Poetic Sense in *Goddess* (Japan) Hengda Linai (23)
- Violent and tenderness
——On Two Characters of *Goddess* Given by Hakata Bay Wu Jiping (26)

Modern Culture

- "Harvard Three Outstanding Heroes" and the Ideas of New Humanism and Rationalism
..... Zhu Shoutong (32)
- The Discipline to be Upheld and Teaching Straining
——On Teaching of Modern Literature between Reality of Oppression and Reality
of Temptation He Xifan (39)
- Cage and Signifier
——On the Paradox of Thought 、 Meaning and Language Li Bei (46)

The New Views on the Literary History

- The Image of "Shame"
——As a National Self—criticism of Lu Xun Literature (II)
..... (Japan) Wanwei Changxi, translated by Qin Gong (54)
- Lu Xun's Sense of Death and the Enlightenment Thought of Modernity
..... Liu Yijun, Wu Chunli (80)
- The Enlightenment's Love and Death: Re—interpretation of Lu Xun's Novel *Shangshi*
..... Wang Shudong (87)
- The Patter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Modern Transition
——From Liang Chi-chao's "Fiction Revolution" to "May Fourth Literary Revolution"
..... Wang Guimei (95)
- Shen Congwen's Experience of Existence in 1940
——The Center Investigation about *Zhuxu* Zhang Sen (104)

- Dialect in Poetry: the Question of legality and Anxiety of Identity ... Yan Tonglin (114)
- The Navigation of Knowledge and the Imagination of History: Re-reading Wu Xinghua
..... Zhang Songjian (123)
- The Query of "Nine Leaves School" Deng Zhaochua (144)
- Literary Production, Dissemination and Effects of *Rosy Dawn* Collection ... Xu Jiang (156)
- On Lin Mang's *I Flow through This Piece of Land* ... (Korea) Bai Zhenshu (163)
- Ma Qiao Dictionary* and the Ironic Spirit of Kundera Gong Minlü (181)
- The Standards of Criticism and a Test to *Local Cotton* Bai Hao (189)

Chinese Literature Archives

- Chinese New Poetry Archives; 1955 Liu Fuchun (198)
- On the Left Side: Mao Zedong Era's Lyric Poet and Other (I) Bai Hua (222)
- Chinese Modern Novels Chronicle (II) Chen Siguang (278)

New Trends

A Complete Chen Jingrong

- Reading *Chen Jingrong Collected Poems* Linghu Zhaopeng (304)
- The Re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History in the Perspective of Chronicle
- The Assessment to Chen Siguang's *Chinese Modern Novels Chronicle*
..... Wu Touwen (307)

- Notice to Contributors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311)

重建诗歌精神的当下阐释

□ 干天全

中国新诗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今经历了大起大落的两种命运，新诗潮的涌现迅猛地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发展，中国再次体现出泱泱诗国的气象，诗歌拥有广大读者，诗人备受尊重。后新诗潮兴起，诗坛也的确热闹了一阵，但面临社会的转型和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向，诗歌开始走向了边缘，并随之出现了诗歌危机和诗歌精神危机。这样的危机一直持续到今天。许多曾热爱诗歌的诗人心怀焦虑，徘徊在诗歌的边缘上艰难守望。也有不少诗人放弃了诗歌，转向其他的生存之路。还有一些急功近利的诗人有违诗歌精神，以种种非诗的作品加速了读者对诗歌的间离。造成这样的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诗歌精神的沦丧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对诗歌和诗歌精神危机，不少诗人和批评家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呼吁重建诗歌精神，本文也就此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诗歌精神的演变与诗歌精神的危机

古代与现代的诗歌受不同时代政治、社会、文学风气的影响，所体现出的诗歌精神有很大的区别。秦汉诗歌主要表现的是“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载道和教化精神。秦汉以来，历代大多数诗歌都体现了这样的精神。宣扬忠孝、赞美朝廷、抒发抱负的封建伦理成为封建时代诗歌的主流精神。当然，封建时代也有不少诗表现出反抗压迫、追求自由、关怀民生的人本精神。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时期，正在创建的中国新诗的启蒙观念所体现的主要是反封建、反专制、反压迫以及追求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的精神。因此，现代诗歌中有大量的作品充满了改造时代的呼声和愿望。现代新诗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有人对新诗的精神做出阐释，大都集中在新诗现代化理念上不安现状、反叛传统、不断革新、不断创造的精神。无论诗歌精神怎样演变，但诗之为诗，应该有它本质的恒久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民族和全人类共同需要的诗意精神，即向善向美、反抗压迫、崇尚自由、张扬个性和关怀人类生命的精神。诗歌的这种本质精神在任何时代都不能缺失，尤其是在以人为本的现代社会更应张扬这样的精神。

从“五四”以来，新诗就在追求以人为本的现代诗歌精神。但不同时期的诗歌总是体现出不同层面及内涵的精神。在抵御外敌且国内民族矛盾尖锐、政治斗争激烈的时代，新诗更多地继承了诗歌传统的载道精神，看重“大我”，倡导诗

歌的“教化”、“鼓动”社会功能。“五四”期间反帝反封建的诗歌、抗战时期号召保家卫国的诗歌都体现了强烈的担当精神以及民族和人类生命的关怀。与此同时，诗人们也在以追求诗美的精神对新诗形式的建设做出不懈努力。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以来，人为扩大的阶级斗争、大跃进盛行的浮夸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以致极左思潮的泛滥、逐渐升级的思想专制而导致的“文化大革命”，不断地异化和扼杀着诗歌。许多诗歌偏离了艺术本质和艺术发展的轨道，成了政治的工具和传声筒。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诗歌已经丧失了正常意义的担当精神和审美属性。大量万众同声的颂歌、赞美诗、表忠诗充斥了整个中国诗坛。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国人的思想开始解冻，诗歌创作获得了精神大解放，新诗潮中涌现的大量作品对极左的卫道文学进行了反叛，人性和诗美又回到了诗歌。有担当精神的诗人们反思历史，批判现实，关注民族振兴和个人命运，疾声呼唤民主与自由，他们的作品在全国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并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新诗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发展，中国新诗的思想含量和艺术品位都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但是，社会转型带来的价值观、人生观、伦理道德观等多种变化，又滋生出权钱交易、贪污腐败、道德沦丧、人伦败坏、极端自私等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不能不影响着诗人的生存和价值观念。随着商品经济的冲击和信仰出现危机，许多诗人动摇了自己的操守，放弃了自己应该担当的神圣使命和对诗美的执著追求。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新诗严重脱离了社会与时代，反崇高、反英雄、反担当、反文化的写作开始泛滥。90年代以来的个人化写作，使不少诗人将自己的写作态度置于“私人”而不是诗人的立场，无视公众，逃避现实，随心所欲地描写日常生活琐事和绝对个人的心灵感受。一些诗人甚至热衷写下半身诗、垃圾诗、口水诗。这样的诗歌现状不能不使广大的读者失望，诗歌在远离读者，读者也远离了诗歌。谢冕指出：“有些诗正离我们远去，它不再关心这土地和土地上面的故事。我感到有时读诗使人感到痛苦。不是那诗写的是痛苦，而仅仅因为它与痛苦无关，也与欢乐无关，或者说，它与我们的心情和感受无关。我们无法进入诗人的世界。那里的形象和意象拒人于门外。”^①大量的诗歌消解或缺失了担当精神与诗美精神，成为写诗的人的自娱自乐或圈内的狂欢享受。越来越多的读者怀疑他们读到的那些分行文字是不是诗歌，以至于不愿再读诗歌。当然，读者疏离诗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诗的思想含量和艺术品位、商品经济的冲击、人们价值取向的变化以及精神寄托的多元化选择。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诗歌远离了读者的生活和审美情趣。

从本世纪初到现在，诗歌并没有像上个世纪有人预言的那样迅速消亡，但诗歌精神的沦丧却加速了诗歌的边缘化，使诗歌面临空前严重的危机。面对诗歌生存和发展的艰难处境，任何有良心和使命感的诗人都应认真思考如何重建诗歌精神。

^① 谢冕《有些诗正离我们远去》，《中国文化报》1996年7月28日。

二、当前诗歌精神重建的基本理念

面对诗歌边缘化所反映的诗歌精神危机，我们如何重建诗歌精神？不少诗人和诗评家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第二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上，来自国内外的学者、批评家对当前诗坛现状及新诗精神重建等问题进行了研讨。西南大学蒋登科教授强调了诗歌精神重建的重要性，认为个人性写作立场是导致诗歌精神内缩甚至萎缩的主要原因，在对这类诗歌创作路向提出质疑的前提下，倡导诗人应该提升和超越个人体验进而关注现实人生的普遍际遇和生命存在的纯真意义。新西兰游子的发言明确宣称要对那些“唯我独尊”的诗歌创作和评论进行“革命”，并希望通过树立科学的诗观和诗学研究方法来解决目前诗坛存在的诸多弊端。华侨大学毛翰教授发言说，要对那些具有“奴性和势利”气息的诗歌和诗论宣战，让诗回归诗性立场。吕进先生重申了他在《三大重建：新诗二次革命与再次复兴》^①论文中对当前诗歌精神重建的看法，强调了诗人及诗歌应具有一种责任担当和社会良知。《诗刊》主编叶延滨在《中国诗歌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角色》中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诗歌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传统主流和“皇冠”的位置，从文化中心的位置向边缘滑落，“这种情形下，有追求有良知的诗人，都应看到商业文化和强势媒体对诗歌的影响，认真研究诗歌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机遇与困境，坚守对诗歌的信念，维护人类情感的尊严，保持对母语和语言的敬畏，提升诗人的道德底线”^②。这些看法对诗歌精神的重建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在当前的形势下，我认为重建诗歌精神应着重强化诗歌信念、担当精神、道德精神和诗美精神的几个基本理念。

坚定诗歌信念是诗歌精神重建的前提。如果面对当下诗歌的边缘化就动摇了对诗歌的信念，甚至悲观地认为诗歌在走向消亡，就根本谈不上诗歌精神重建的问题。悲观是不必要的，诗歌乃至整个文学现象的此消彼长适应着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转型时期导致的诗歌低落并不意味着未来社会对诗歌的排斥。正如黎风所说：“90年代后期以来，几乎所有对中国当代新诗作积极理论建设的诗学论说都以悲观主义的概观作为言说‘起兴’，其主要依据大多是当下中国文化的商业化、世俗化的巨变所显而易见的文学生态与诗歌现实（诗刊倒闭、诗人自杀、诗集滞销等），这些看法似乎大都停留在一般社会认识的‘公共感觉’上而缺乏诗学理论的阐释，更无法从文化结构的转型、语境的现代性（非文本等）挑战、知识经济的全球化和诗歌言说的多元化等方面提供中国当代新诗‘末日论’的学术证据，充其量只表达了一种文化身份心态受创之后的失落感，一份在悲观主义假象面具掩盖下的乐观主义的内心期待。”^③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国人并非不需要

① 吕进《三大重建：新诗二次革命与再次复兴》，《西南大学学报》2005年1期。

② 叶延滨《中国诗歌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角色》，《理论与创作》2007年4期。

③ 黎风《对当前几个诗学热点问题的思考》，《文艺与理论》2001年3期。

诗意的栖居，也并非不需要阅读诗歌。就诗歌的生存状态而言，虽在形式上远没有 80 年代上半叶的热闹和下半叶的喧嚣，但全国的民间依然有数以千计的民间刊物在顽强地举办，诗歌依然在大、中、小学文学社团的文学刊物里占着相当的比例。自 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网络诗歌以来，专门网站不断扩展着规模 and 影响。近几年来，全国从中央电视台到地方所举行的数百场规模不等的诗歌活动和赛事，都证明着诗歌的存在，即便是艰难的存在，也表现出诗歌顽强的生命力。2008 年，5·12 大地震掀起的全国性地震诗潮，再次证明了人们对诗歌的需要，同时又体现出诗歌的特殊作用。

担当精神是诗歌的重要品质。中国历代诗人大都具有担当精神。尤其是在国难民忧的时期，诗人们秉承“哀民生之多艰”的诗学传统，自觉地为国为民疾声呼号。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不少名篇佳作都是以关注时代、关怀他人乃至大众生命而获得读者承认和喜爱的，如屈原的《离骚》、司马相如的《郊祀歌》、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秦中吟》、范成大的《催租行》、刘基的《田家》等。这样的诗歌精神体现的是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无疑是应该继承和发扬的。受传统诗歌精神的影响，现当代诗人所写的诗歌，也有不少属于关注时代和他人的佳作，如闻一多的《死水》、艾青的《黎明的通知》、臧克家的《老马》、舒婷的《祖国啊，亲爱的祖国》等。诗与任何时代的社会都处于无法割断的联系之中，诗人总是既属于自己，也属于自己的社会和时代。诗歌的担当精神并不排斥个人生命关怀，因为没有个人生命关怀，人类关怀就是一句空话。历代的优秀诗歌中也并不乏个人关怀的作品，如李白的《将进酒》、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李清照的《重阳》、穆旦的《诗八首》、郑敏的《寂寞》、余光中的《乡愁》、北岛的《雨夜》等等。这类属于个人关怀的诗歌之所以感人并广为流传，就是由于他们写出了在时代与现实中个人对人生的独特感受，以个人的生命体悟烛照了他人的心灵，并以个人的人生遭遇和经验引起了人们的共鸣。从人性和人道的角度看，充满着真、善、美的个人关怀与人类关怀的精神本质是一致的。

如果诗人有意无意地脱离生活，逃避现实，对社会的发展和他人的命运漠不关心，一味躲进自己有限的心灵空间，写一些无病呻吟、矫揉造作、自我麻醉的东西，将诗中的人性、人道导向极为狭窄的个人关怀，这样的诗歌恐怕就只有孤芳自赏了。诗歌创作的内容是丰富无限的，诗人的抒情也是多元复杂的。没有任何理由让诗人只写崇高、理想、英雄、忧患意识，而不反映自己内心私密的情感。但仅仅局限于写与现实生活、人类社会相脱离的那点内心感受，虽然也能反映出个人的某些真实情感和生命体悟，但所写内容是极为有限的，写出的作品也难以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而且情感会越来越枯竭。对于诗人在抒情上狭小地表现“自我”这一点，歌德早就指出：“要是他只能表达自己的那一点主观情绪，他还算不上什么；但是一旦能掌握住世界而且能把它表达出来，他就是一个诗人了。此后他就有写不尽的材料，而且能写出经常是新鲜的东西。至于主观诗人，

却很快就把他内心生活的那一点材料用完，而且终于陷入习套作风了。”^① 这样的观点无论是在歌德时代还是在当前，于诗人都是有益的忠告。在一些人理想坍塌、丧失信仰的时代，诗人更应该具有担当精神，在进行个人关怀的同时顾及人类关怀，在人类关怀中丰富自己的生命体验，开阔自己的创作视野，让自己的创作适应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的心灵需要。作为体现民族精神、民族审美和诗人人格的诗歌，理应对反文化、反理性、解构崇高、取消意义的思潮，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创造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诗歌。

道德精神是诗人必要的操守。担当精神体现着诗人的人生责任和社会责任，道德精神体现着诗人的人格和社会文明。中西诗学的传统都十分重视诗歌的道德精神。中国传统诗学的“思无邪”及“兴、观、群、怨”之说，西方古典诗学的心灵“净化”学说，都有关道德实践并以道德目标为指归。在崇尚道德的时代，对于诗歌的道德要求与道德评判显得很自然，诗歌的道德承担与诗歌所发挥的道德功用也远比道德沦丧的时代直接、有效。这种情形在商品经济现实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名利冲淡了道德的神圣，甚至使道德变得虚伪。道德沦丧的风气明显地反映在一些诗人的作品中，一些诗人置伦理道德于不顾，肆意宣泄私心与欲望。前几年喧嚣一时的“下半身”诗歌和“垃圾派”诗歌就突出反映了这种现象。“下半身”诗人将自己定位在与整个诗歌乃至整个文化现实相对立的位置上，公开宣言“追求的是一种肉体的在场感”，用诗歌文字赤裸裸地表现性交。“垃圾派”诗人以写“垃圾”为快事，甚至于热衷“把诗写在尿上”。这样的诗歌并不能解释为是对文化的叛逆和“大胆地袒露人类的龌龊心理”，相反，暴露出“下半身”和“垃圾派”诗人道德精神的失落。波德莱尔说：“恶习是诱人的，应该把它描绘得诱人，然而它拖着特别的道德疾病和道德痛苦，应该描绘这些疾病和痛苦。像在医院里工作的医生一样研究一切创伤吧。”^② 同样是审丑，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揭露、讽刺了工业时代道德沦丧的社会所产生的种种丑恶现象，体现的是救治道德疾病和道德痛苦的担当，其道德批判效果更加强烈和集中。因此，善于从审丑中发现美、体现诗歌道德精神的波特莱尔受到了中外诗坛的肯定。我国当下的诗歌，既要以审美的姿态反映时代的进步和文明，也不回避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而是报以必要的审丑姿态。应该明确的是，审丑与审美的立场是一致的，两者都应具有鲜明的道德精神。道德精神体现着诗人的人格，诗人只有具备道德精神的操守，才能写出品位高尚、符合民族伦理和道德规范的作品。

追求诗美是诗人必须具备的艺术精神。近些年在关于诗歌精神重建的问题上，不少诗人和批评家集中强调了担当精神。我认为这是不够的。诗歌精神不只包含了担当精神，还包含了追求诗美的精神。中国历代诗人都为诗美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大量优秀诗歌的流传不仅与它们的内容美有关，也和它们的形式美分不开。古典诗歌从古风到格律，从意象意境到炼字炼句，都体现了古代的优秀诗人

① 爱克曼辑录，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96—97页。

② 波德莱尔《正派的戏剧和小说》，《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页。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审美追求。现代诗歌从重在白话到“三美”建设，从“纯诗”追求到延长审美距离、加强审美效果的“陌生化”，现代诗歌创作都做了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古典诗歌和现代诗歌追求诗美的精神都是值得弘扬的。从20世纪末延续到现在的诗歌危机，不谈社会转型的客观原因，仅就诗人和诗歌的主观原因而言，除了担当精神的缺失，追求诗美精神的淡化或缺失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从官办刊物、民间刊物以及网络上发表的诗歌来看，大量的诗歌均自由散漫无度，随心所欲的白话和口水话充斥其间，许多诗歌都缺乏诗美的特征。泛滥一时的“梨花体”诗歌迅速遭到广大读者的抨击和唾弃，正是因其既无诗意又无诗美。一些诗人不是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对诗美的追求上，而是花在玩弄主义和许多无谓的争论上。诗人的行为主要是创作，当然也可以发表自己的创作主张，但不必花很多时间去纠缠五花八门的主义，更不必去拉帮结派，争夺所谓的话语权或制造意图引起轰动效应的荒谬试验。古今中外许多优秀的诗人并没有拉起什么主义的旗号，也不属于什么诗歌帮派，却留下了许多佳作。诗人应该让诗歌说话，主义和帮派以及各种各样人为的轰动效应，对诗歌自身的品位和发展并无意义，也不会为诗人带来良好的影响。真正的诗人不仅以博大的胸襟体现人文关怀的诗意，还会以追求诗美的执著精神来对待诗歌创作。诗人只有创作出内容和形式俱美的作品才会在读者中树立口碑，这样的诗歌才是有生命力的，自然也就可以流播和传颂。

诗歌的精神危机严重影响着诗人的创作态度和诗歌的质量，极大地阻碍着新诗的现代化，重建诗歌精神是当下诗人坚定诗歌信念、发扬担当精神和追求诗美精神的必由之路，也是推进新诗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强大动力。从工业化时代到后工业化时代，世界的经济文化有了迅猛的发展，人们思考的深度、广度和复杂程度都是过去的时代所不能比拟的。这一切不断地改变着诗人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和创作行为。诗歌的现代化应反映出人类文明的进步和提升。诗人是社会的精英，作为人类文明的精神体现者，理所应当把现代人文精神与诗歌精神统一起来，不断提升自己的人格素质、文化素质和审美素质，创作出真正具有现代化品质、适应现代社会的诗歌。

面对诗歌的边缘困境和诗歌精神的危机，诗歌精神的重建并非易事，但这是中国诗歌生存和发展的必须。如果丧失了对诗歌的坚定信念、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担当精神，如果失去了作为诗歌内核的民族精神和人文关怀，新诗的发展就会成为一种奢望。因此，在新诗建设的若干问题中，我们应该把诗歌精神的重建当成一个首要任务，从而在诗歌的创作和理论实践中做出积极的努力。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郭沫若的万宝常研究之动机与意义

□(日本) 藤田梨那

序

1928至1937年,郭沫若在日本渡过了近十年的流亡生活。其间,他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中国古文字和古代社会研究。1936年,郭沫若在中国和日本的杂志上发表了有关隋代音乐家万宝常的研究论文。不大精通音乐的郭沫若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发表这样的论文呢?不能否认,他对万宝常的研究与翻译和林谦三出版《隋唐燕乐调研究》有着直接的关系。另一个方面,亡命日本期间在对中国古文字的研究中,他特别倾心于王国维,由此产生了对曾被权利所抹杀、被历史所遗忘的历史人物进行挖掘和再评价的强烈的使命感。这个使命感与研究万宝常有着密切的关联。

我们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及其自传《我是中国人》中可以看到郭沫若对王国维、罗振玉的评价。再将林谦三在《隋唐燕乐调研究》中所依据的《隋书》、《旧唐书》等与郭沫若所根据的史料仔细对照,便可以验证二人对“应声”与“八十四律”的着眼点不同,进而明确探索到郭沫若对万宝常研究的动机与其意义。

一、郭沫若与中国古文字研究

郭沫若流亡日本后不久就开始了《易经》的研究,先后注意到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释》以及王国维的古文字研究。他参考的书籍有:

罗振玉 《殷虚书契考释》、《殷虚贞卜文字考》

王国维 《观堂集林》、《海宁王忠愍公遗书》

1930年,郭沫若的第一本研究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

笔者在此关注的问题是,郭沫若在史学研究上对王国维的评价与倾倒。所根据的资料如下:

1.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

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实际作了一番整理工夫的要算是以清代遗臣自任的罗振玉,特别是在前两年跳水死了的王国维。(中略)王国维,研究学问的方

法是近代式的，思想感情是封建式的。罗振玉的功劳即在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郭沫若全集》历史篇第1卷第8页）

2.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三章“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中举了王国维编辑、流铁云搜集殷虚文字以及《戡寿堂所藏殷虚文字》的编辑名誉被盗之说。

这位甲骨的搜藏家（流铁云）一流窜至死之后，他所有的甲骨也和他的主人的命运一样向世间飞散，有一部分为上海哈同所得，后来王国维为他编印了《戡寿堂所藏殷虚文字》一卷（1917）。此书编者的名誉为姬某所盗，然据《王国维全集·观堂别集》中《随庵所藏甲骨文字序》，王氏自云：“丙辰丁巳（1917）间，铁云所藏一部归于英人哈同氏，余为编次考释之。”（《郭沫若全集》历史篇第1卷第190页）

3. 《我是中国人》

王国维的存在，我本来早就知道。（中略）读到了《殷虚书契考释》，对他的感佩又更加深化了。我不禁起了这样的怀疑：这样有条理、极合乎科学律令的书会是罗振玉的著作吗？它的真正的作者不可能就是王国维吗？这个怀疑不久我就证实了，原来是罗振玉花了几百元，买了王国维的著作权并著作者的名誉。

王国维把自己的著作、名誉卖给了罗振玉，明显地是出于报恩，而强盗名誉的文化贩子罗振玉，到后来竟逼得王国维跳水。（《郭沫若全集》文学篇第13卷第364页）

郭沫若对王国维的关注点可归纳为三点：1. 古文字研究的业绩；2. 为罗振玉牺牲了自己的著作和名誉；3. 被罗振玉所逼而自杀。

以上三点中的后两点已有不少人涉及，如刘惠孙《关于〈殷虚书契考释〉成书过程的回忆》、佐藤武敏《王国维的生涯与学问》等。长期以来，罗、王交往的真相一直是个疑团。有关《殷虚书契考释》作者的问题，在郭沫若流亡期间已有各种议论^①，郭沫若偏重于以王国维为撰写者的意见。这并不是因为他听信别人的主张，而是根据他对《殷虚书契考释》与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的比较，提出“相隔仅仅五年，而两书丝毫也找不出条贯性来的”疑问。可见，郭沫

^① 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中提到1927年的《国学月报·王静安先生纪念号》中的一些文章，这一期里有耕僧、储皖峰、姚名达、殷南、柏生、梁启超等的文章。傅斯年亦在《殷历谱》序中以王国维为《殷虚书契考释》的作者，批驳罗振玉收买王国维的著作。郭沫若1928年已与傅斯年相识，或许参考了这些文章。

若是根据自己的学术评价来判断的。笔者注意到郭沫若对文化盗窃的愤怒，注意到他对被盗窃、被历史所埋没的人的同情。这种正义感代表了他的历史观，这种正义感也正是他关注隋代音乐家万宝常的重要动机。

另外，郭沫若的古代社会研究又将他的视线引向了文化研究。正如《我是中国人》所述，他的研究从甲骨文发展到天文学、支干研究、古代音乐研究。这样的文化关注不仅仅限制在中国古代，还涉及了日本文化。1935年，他在题为“中日文化的交流”的讲话中就提到了日本的雅乐与隋唐音乐的关系。他与日本艺术家林谦三的交往也促进了他与万宝常的接近。

二、郭沫若与林谦三

林谦三（1899～1976）是日本现代艺术家、古代雅乐研究家。郭沫若在流亡期间曾与林谦三有过密切的交往。1935年，林谦三的第一本古代宫廷音乐研究著作《隋唐燕乐调研究》就是由郭沫若翻译成中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林谦三有关古代雅乐的研究成果基本上从这个时期开始陆续发表的^①。其实，他们的交往开始得更早。让我们来看看《隋唐燕乐调研究》中郭沫若的序：

余识林氏在1928年，而来已历八载，他的为人与求学的态度是我所敬佩的。他为人很谦和，而为学极专挚，积稿如山，但从不见其发表；因而在日本人中也很少有人知道他是这一方面的笃学。他这次撰述了这部《隋唐燕乐调研究》愿意先用汉文来发表，我便从原稿的形式中替他移译了过来。我自己所得的益处是很不少的。（第1页）

可见，二人的交流开始于1928年。郭沫若对林谦三的为人与学问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隋唐燕乐调研究》林序中也有这样的叙述：

沫若先生乃余多年所兄事之畏友，以数年来之友谊自行为后进之余执此小著移译之劳。（第3页）

这亦证明他与郭沫若的友谊历经多年。参阅殷尘《郭沫若归国密记》，郭沫若研究古文字过程中曾多次请林谦三拍摄一些拓本^②，可知他与林的交往也与古文字研究有着密切的关联。

① 《律名新考——日本十二律的起源及音高问题的研究》收《乐道选书》（1935—1936）、《雅乐、古乐谱解读》（1969）、《关于时代的箜篌》收《日本音乐与其周边》（1973）。

② 《郭沫若归国密记》第16章“河井荃芦”中，金祖同回忆1936年间他刚来日本时，曾与郭沫若一起到河井荃芦家去拍摄安氏《石鼓文》，当时郭沫若请了林谦三来拍照（第61～68页）。